

电 视 丛 书

荧 屏 岁 月 记

主 编 于广华

副主编 马超曾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戴联斌

装帧设计：尹凤阁 阮双庆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罗世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荧屏岁月记/于广华主编.

YINGPING SUIYUE JI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

(电视丛书)

ISBN 7-01-001646-1

I. 荧…

II. 于…

III. 中央电视台—史料

IV. G229.24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

字数:455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12.30元

目 录

总序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杨伟光(1)
一个老兵的祝愿	梅 益(1)
庆祝和怀念	孟启予(4)
我接待布什总统的前前后后	黄惠群(9)
乐在屏幕	洪民生(14)
——回忆点滴	
新闻生涯点滴	杨伟光(27)
亲切的关怀 难忘的教诲	于广华(41)
——记周恩来同志和电视记者在一起	
山河悲泣的年月	夏之平(51)
——忆对悼念周总理进行电视报道的曲折过程	
成长与思考	李 华(58)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影视工作者	叶 惠(67)
赴浙江采访的一段回忆	朱景和(73)
在创业的年代里	邓 劲(81)
春风夏雨颂前贤	黄一中(87)
廉洁奉公 艰苦奋斗	石风山(93)
——对六十年代新闻部记者作风的回忆	

雪山峡谷 70 天	吕逢欣(104)
炸弹在身后爆炸	韩金度(118)
——回忆在越南工作的一段经历	
随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大采访记	赵立凡(127)
震后赴唐山	刘效礼(134)
——一次突击采访拍摄的回忆	
空难幸存者的话	李海明(136)
难忘的岁月	孔令铎(141)
无痕的痕迹	田亨九(150)
在香港采访的日子里	臧树清(158)
离休前的最后一站	江 炎(164)
远征南极	庞一农(169)
难忘的 142 个日日夜夜	
回顾国庆 40 周年的电视宣传	王传玉(182)
回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现场直播	史启新(192)
为了光辉的一瞬	杨宪文(195)
——记发射亚星、澳星现场直播的导演工作	
侃侃我们的台湾行	张长明 景春寒(202)
我的电视学术研究活动	马超曾(213)
生日抒怀	刘效礼(222)
——献给 CCTV35 周年	
记现场直播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张家成(229)
西藏高原取火记	曹玉春(237)
笑迎天下客 服务亿万人	宋福民(243)
——记亚运热线电话开通的日日夜夜	
电视工作者的拼搏	刘习良(247)

难忘的洛桑会议	岑传理(250)
亚运、奥运中的电视人	马国力(254)
六十年代初期的《生活知识》节目	顾群星(273)
对《卫生与健康》节目的回忆	刘元祯(276)
事与梦	徐雄雄(280)
洒向人间都是爱	张 鸣 子 和(285)
——拍摄大型电视教学片《马礼堂养气功》散记	
我与少儿节目	徐家察(290)
四进西南	高 峰(300)
为《话说运河》画句号	寿沅君(309)
——追忆我国首次双向传送现场直播节目	
土法上马,荧屏里放电影	徐增祁(317)
不要忘记幕后英雄	莫 瑶(319)
——记聆听周总理的一次教诲	
我随电视转播车走遍祖国南北	刘荣发(322)
难忘今宵 告别今宵	黄一鹤(327)
——回忆我的电视艺术生涯	
难忘的国庆 35 周年焰火联欢晚会实况直播	张复华(342)
我和中央电视台	胡 旭(350)
一个五十年代电视演员的回忆	邹道语(354)
忆直播时期的电视演出	陈 锋(358)
从《一口菜饼子》到《墨舞》	余 珉(361)
从首播室内剧到电视剧制作中心创立	文英光(373)
在中央电视台和电影厂之间建座桥	林 航(377)
——影视部合作拍片工作回顾	

忆《红与黑》的译制工作	潘耀华(382)
影视艺术一枝花	张文琴(384)
——电视译制片工作片断回忆	
幸运的第一个	沈 力(389)
昨夜星辰昨夜风	赵忠祥(394)
我主持《为您服务》	张 悅(428)
机遇与其他	杨 澜(431)
流泪·高兴·奖牌	宋世雄(434)
电视直播时期的值班导演工作	赵 群(436)
难忘的日日夜夜	秦芝莲(441)
艰苦创业 走出新路	宋培福(445)
谈电视声音艺术的创建	
建台首播的音乐设计	曾文济(448)
忆直播时期的音响工作	杨美莲(450)
邓大姐审片前后的追忆	郭玉华(454)
回忆周恩来总理对新闻照明工作的关心	张敬邦(459)
为屏幕增光添彩	王 林(462)
——中央电视台照明工作的回顾	
画中的回忆	张德生(467)
从“救场如救火”想到的	
.....	徐世荣(472)
忆电视片洗印制作的发展过程	刘琴波(478)
我的回忆	章之俭(482)
首次试播的技术准备	张正道(490)
电视春秋	潘殿奎(494)
幸福的时刻	李汉杰(500)

——记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安装电视机	
忆《中国电视报》的创刊	赵 群(502)
电视良友 读者知音	周金华(527)
——记《电视连环画》办刊五年	
无锡外景基地创业记	笪远怀(534)
回顾中央电视台旧址和新址的筹建	蒋建忠(542)
我与电视台的初期广告业务	徐兴华(550)
回忆财务和经营工作中的几件事	刘祖华(552)
中央电视台干部挑选片段回忆	郑 瓷(560)
四年的回顾	张君实(563)
台办公室工作今昔谈	刘俊改(567)
忆中央电视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沈朝周(576)
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散记	樊必智(579)
编后记	(588)

一个老兵的祝愿

今年是我国第一座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创立 35 周年。35 年来，我国的电视事业取得了足以自豪的巨大成就。作为一个曾从事电视工作的老兵，我谨向曾经和正在为我国电视事业献身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说中国电视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论是从事业规模，还是从社会影响来说都是事实。35 年前，我国电视业是在很落后、很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那时，我们千辛万苦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北京电视台，整个首都只有几十台电视机；而现在，电视节目的时间已成百倍地增长，彩电中心大楼已正式启用，我们自己的电视卫星已经上天，电视已进入千家万户，看电视已成为广大城乡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提到我们取得的成就，就很自然地想起我国电视业开创时经历的艰难。

最早提出要办电视的是毛主席。在 1954 年“文办”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文办的副主任钱俊瑞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进一步发展文教事业的意见，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毛主席提出的要办电视和发展对外广播的指示。中央正式提出要办电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当时我做了详细的记录。在广播事业局党组的会议上，我及时作了

传达，大家都非常兴奋，但对如何贯彻这一指示，真有点“老虎咬天，无从下口”之感。不久，我们就派出了许中明同志负责的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去作调研工作。1955年我在路过苏联时，也提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他们的电视实验台的要求。在摸索过程中，我们继续培训人才，广泛搜集有关技术资料，为创办电视事业打下基础。

当筹建工作正在继续进行，经过近三年的摸索和研究，我们心中对电视已比较有数的时候，有一件偶然的事逼着我们下决心尽快上马。1957年下半年，我们得到台湾将在美国RCA的帮助下建立电视台，并定在1958年“双十节”开播的消息。我们坐不住了，下决心要争这口气，一定要走在他们的前头。就这个想法我们征求了当时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契柯年柯的意见。他朝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说我们还缺乏发展电视的条件。可是我们不信邪，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虽有风险还是应当上。我们把日本展览会（原名记不得了，就是那次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在新中国第一次升起太阳旗的展览会）上展出的50瓦发射机、摄像机都买下来作为样品，同时靠几位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工程师，还有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北京广播器材厂的领导和工人，紧紧团结在一起，开始了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使广播事业再上一层楼的决心，就像核裂变一样释放出难以估计的能量。1958年4月，功率为1000瓦的发射机（这实在小得可怜，但是买来的日本造的20倍）以及全套播控设备终于试制成功。几个月后，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就诞生了。

北京电视台提前开播。这里有一个插曲很有趣，值得说一说。我们自己制造的摄像机有一个零件是美国RCA的产品，当时我们确实生产不了这精密的零件。有一位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外国记者来参观，故意挑刺，说我们用了美国的零件，这不是丢脸吗？这个问题使我们为难，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既是自己制造的，就

绝对不应该采用外国的零件，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北京电视台开播后，外国通讯社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并强调设备是中国制造的，但并没有人来制造麻烦。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这是党一再教导我们的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的体现。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自己还制成了赶上当时国际水平的 1000 千瓦中波机和 120 千瓦短波机，稍后还着手开展了彩色电视和录音磁带的研究、试制工作，这些也是上述精神的体现。

庆祝和怀念

中央电视台 35 周岁了。我仿佛觉得他像一个咿呀学语、跌跌撞撞学步的婴儿，一晃就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巨人，进入亿万家庭，走向五洲四海。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和关怀下，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中央电视台已于 1988 年迁入占地总面积为 48000 平方米，地上 24 层，地下 3 层的彩电中心大厦。它拥有大、中、小 24 个演播室，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装备，拥有一支强大的编播队伍，在外地还有几处相当规模的电视剧摄制基地。它拥有 6 亿以上的电视观众。中央电视台理应并已成为“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并通过电视节目的交流和合作增进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贯彻中央对外政策的工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庆幸自己能作为我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筹建创办、成长壮大的见证人和参加者，在已逾古稀之年能看到我国电视事业如此兴旺发达，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为它感到十分自豪，我要为它欢呼，向它表示最热烈的庆祝。

在欢庆的同时，我也不由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在这里，我记下的只是曾使我激动不已的许多往事中的片断

而已。

我永远不会忘记已经和我们永别了的我国三位伟大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电视事业的关怀。

1964年秋，我托人把一封信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家中，请示毛主席为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题字。信中虽然说了毛主席题字的意义和同志们恳切的心愿，但想到毛主席要考虑许多天下大事，所以，当时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况且这封信最终是否能送到毛主席手中呢？……两个月过去了。就在1964年岁末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台里张罗着当晚播出的事情，广播局办公室一个电话把我叫了去，说是中南海送来一个信件，要签字。我飞跑过去，心里猜想准是毛主席的题字来了。果然一个用红漆封好的牛皮纸大信封交到我手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启开，白宣纸上，毛主席亲笔写的“北京电视台”五个大字映在眼前。在场的同志都围过来看了又看。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把题字装进信封，抱着它，又飞快地跑回台里，叫所有在台里的同志都出来看，并让苏实同志（美工播出的负责人）赶紧复制下来准备元旦上屏幕。毛主席的亲笔题字使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大家高兴坏了，也忙坏了，连夜设计如何把它搬到元旦晚上的屏幕上。这题字作为台标，一直出现在电视节目的开始，直到1978年北京电视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更名中央电视台为止。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已被国家珍藏，但毛主席对电视事业的关怀永远珍藏在同志们的心里。

1959年10月19日，刘少奇同志来我台视察。他参观了电视机房、演播室，询问了台里的情况，向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记得少奇同志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的条件还不完备，只能播黑白电视节目，但今后我们必须创造条件把彩电搞上去，人民更喜爱彩电。少奇同志的勉励一直是电视工作者、电视机生产者们的奋斗目标之一。可以告慰少奇同志的是：他的愿望已经实现，我们正向普及

彩电前进。

直接领导广播电视事业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对我国电视事业这个后进的、新生的婴儿的成长更是无微不至地扶持和爱护。

1960年的春天，我们在广播大楼的院子里建起了一座能容纳200个工作人员，面积约5400平方米的电视台，包括大、中、小三个演播室、机房和办公室。当时，我们已经感到相当满足了。但不久就发现，设在地下室的电视片洗印车间太小，而且很潮湿，不能放置足够的和必需的设备，这不仅影响电视片的生产，也影响工作人员的健康。有些人因此患了关节炎，出现心律过速、头昏等症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来了。那时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许多工程下马，基本建设都停工或缓建。我们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之后，总理当即表示，洗印车间的问题必须解决，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应保证电视片的生产和工作人员的健康。随后就批准我们增建一座约有2万平方米的电视片生产楼。从此，我们由几十人到几百人，到1988年初的2000多职工就在广播大院内的临时性电视台工作了将近30个春秋。若没有周总理的英明决定，按当时规定来个“一刀切”，基本建设一律不得上马，那就不知怎样了。可以说，若没有周总理对电视事业直接的具体的领导，就没有中央电视台的今天。

我还深深怀念曾经为创建、开拓和发展电视事业日日夜夜尽心尽力、埋头苦干的战友们。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过早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来不及看到我们电视事业目前所达到的高度，不能分享我们共同的追求取得了重大成果时的欢愉和欣慰；有些人由于积劳成疾，不能亲自前来参加盛会庆典，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为电视事业勤奋拼搏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身旁。

黄云同志，他去世多年了。他曾是我台技术部主任、总工程师，为改善我台的技术装备和基本建设操劳奔走。

1959年为筹创电视大学，扩大收看范围，我们需要一块场地建设一架电视铁塔。电视大学得到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市长吴晗的大力支持。局领导和市委商定由我台和北京市教育局合办电视大学，吴晗市长任电视大学的校长。我国开办电视大学在世界上尚属首创，曾受到外国电视界的重视和赞赏。黄云同志征得吴晗市长的同意，在月坛公园的一角建设一座高约180米的电视铁塔以及机房和教学用的办公室。筹建电视铁塔的工作是黄云同志主持操办的。铁塔竖起来了，收看范围一下子扩大到北京远郊区的几个县。

周总理批准的电视片生产大楼的基本建设工程也是黄云同志领头去完成的。

黄云同志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电视事业所倾注的心血将永远印记在中央电视台的史册上。

苏实同志，他是我台最年长的同志，大家把他看作老大哥。他长于中国书画，曾博得中国书画界的好评和日本友人的赞赏。但他谦虚朴实，从来不露声色，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地从事繁琐的电视美工和播出工作。初创时期电视台人手极少，不可能有那么精细的分工，需要干什么，一吆喝，大家就分头抢着去干。苏实同志更是一马当先，抬布景，扛道具，铺地毯，拉电缆……累得满头大汗，从不抱怨叫累。每天晚上他还负责监看节目播出情况，并且记录下来。若有差错事故，从不疏漏，在当天的播后会上提出，大家一起查找原因、责任。我们的播后会有时开到深夜才散。苏实同志曾被推选为我台的先进工作者，他的事迹写在光荣榜上。大家称他为“老黄牛”。我还曾在他的胸前为他戴上一朵大红花。苏实同志年事已高，已经离休。

技术部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刘××，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几乎丢了性命，经抢救治疗，虽然活了下来，但由于

他的脑部受了重伤，成为一个终生痴呆的残疾人，永远失去了工作能力，也失去了人生应有的幸福……

就在这儿打住吧。回忆使人激动，使人得到深刻的启迪，也使人在怀念中感到心头沉重……

历史告诉我们：对事业执着追求，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必要时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从整体出发，不追逐个人名利和小集体的利益，团结互助，奋力拼搏，这种精神不论任何时代，永远是我们克服困难，发展事业的动力。

“逝者如斯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让我再一次热烈庆祝中央电视台诞生 35 周年！祝愿中央电视台不断前进，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我接待布什总统的前前后后

1989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外交部新闻司打来的电话，说美国新上任的布什总统即将对我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计划中，有一项活动是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采访地点已确定在中央电视台。放下电话后，我顿感心里沉甸甸的，我清楚这是我们台首次接待这样一位大国元首，除要对其进行有实质内容的直接采访外，光是活动本身对于技术、安全以及协调保障诸方面的要求，就是非常高的。能否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其实是对我们台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一次检验。想到这里，我不敢怠慢，迅速处理了一下手头上的常规事务，便立即召集几位副台长开了一个临时碰头会，会上我简要地传达了这一任务的内容，并谈了我的基本意见，与会同志相继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使我得以为此制订出一个更为周密稳妥的接待计划。

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只有两三天，而面临的又几乎都是些尖端问题，为了快速、准确、高效地解决问题，也为了便于集中指挥，我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领导小组，除了亲自担任组长外，成员中吸收了有丰富外事经验的外事处长徐创成和国际电视服务公司总经理郭宝祥。接下来，我迅速对全台各部、处的负责同志进行动员，除反复强调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外，我还对简化接待领导小组的这一

作法和意图进行了必要的解释。在此之后，全台各有关部门便紧急行动起来了。那正是春寒料峭时节，可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中的我却总是忙得热汗淋漓。我会同外交部有关同志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洛德以及美方先遣队的新闻官员、安全官员、技术专家们研究修改实施方案，最后我们达成共识，一致确认了“现场采访 5 分钟，总统从下车进台到离台上车总计 15 分钟”的计划原则。

由于采访时间太短，我们考虑记者如以中文提问，再通过译员翻译，则势必会造成节奏的拖沓和时间的延长。因此我们商定并经部领导批准，确定以英语采访，重播时再译成中文。我们选定台内的英语播音员党兵同志担任采访记者，她接受了这个意外的任务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演练。

对于美方来说，整个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安全专家在我保卫部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多次对总统在台内将经过的路线进行安全检查。他们携带精密的检测仪器，并要求使用警犬，不厌其烦地反复检视每一个细小部位。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台阶侧面的镶板有点裂，便提出让我们钉死，绝不可以有一点裂缝。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最后验收时，美方又突然提出要我们在方楼大门外再增设两门国际直拨电话，理由是“总统需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云云，我们尊重了美方的要求，动力中心立即铺线并架设好电话机，美方通讯官员当场拨通白宫，之后，他竖起大拇指笑着对我说了声“OK！”满意之情溢于言表。

只有一天时间了，我抽空回到 15 楼的办公室里，想独自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喘息一下。连日来马不停蹄地在现场奔忙使我几乎没有在这里停留过。我刚要坐下去，突然一个念头涌上来：布什总统来电视台之前是在大会堂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对于一个年届七旬的人来说，那无疑是一个疲劳的过程，而紧接着他到我们这里是要出镜头的，那么到时他是不是需要化一下妆呢？我凭经验与直觉感